



民国学术文库

民国外语教学研究

张美平◎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民国外语教学研究

张美平◎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外语教学研究/张美平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308-09831-1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教育史—中国—1912~1949 IV. ①G5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3776 号

民国外语教学研究

张美平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831-1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本专著获浙江树人大学著作出版基金、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时期的外语教学回顾	1
第一节 教会学校的外语教学	3
第二节 官办洋务学堂的外语教学	13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下的外语教学	31
第一节 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上海外国语学社	32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上海大学	37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延安外国语学校	46
第三章 教会中学的外语教学	55
第一节 教会中学外语教学概况	56
第二节 “高深学问之涵养”——武昌文华中学	86
第三节 “四方学子负笈来”——北京汇文中学	96
第四章 中华民国的中学外语教学	103
第一节 中华民国的中学外语教学概况	104
第二节 荣光永久招展——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149
第三节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天津南开中学	156
第五章 教会大学的外语教学	167
第一节 教会大学外语教学概览	168
第二节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燕京大学	201

第三节	“东方的哈佛”——圣约翰大学	215
第四节	规模宏大、修理整齐、教育良善——岭南大学	230
第六章	中华民国的大学外语教学	245
第一节	中华民国的大学外语教学概况	247
第二节	外国语专门学校	272
第三节	自由独立,兼容并蓄——国立北京大学	279
第四节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国立清华大学	291
第五节	学术重镇,人才摇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305
参考文献		320

第一章

晚清时期的外语教学回顾

中国外语教学历史源远流长。许多典籍中便有一系列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四方部族交流的记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云：“秦汉以来，设官主掌蛮夷之始。所谓大行令，即《周礼》行人之职，译官即《王制》所谓寄、译之类也。考史，昭帝用苏武为典属国，亦掌夷狄之官。”^①被称为“通外国之言”的“象胥”一职早在周朝（前 11 世纪—前 256 年）就有了。但是，对于那时候人们的外语学习和以培养翻译官员为目标的外语教学活动，可惜没有可靠的史料记载。于史有征的外语教学活动，以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元大都（今北京）设立的回回国子学为最早，这是培养波斯语和“亦斯替非文字”^②译员的学校。其后，则有明朝的“四夷馆”，^③主要从事培养专门翻译，教授边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语言文字。明末清初有四译馆、会同四译馆，专司翻译和除汉语外的各语种教学。再往后是俄罗斯文馆，这是培养俄语翻译以满足当时中俄之间交往需要的学校。我国英语教学的开始时间相对较晚，可追溯到 19 世纪上半叶英美传教士在我国澳门、香港等地创办的教会学校。

最早面向华人开始英文教学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夷情备采》^④中提

① [明]林尧俞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九，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678—679 页。

② “亦斯替非文字”是一种古代伊朗人所发明的特殊的文字符号，用于政府之间财务税收、记账等实务。这种文字类似缩写符号或象形文字，需经过专业培训方能掌握。

③ 关于四夷馆的翻译教学，详见张美平：《教习译写番字，事虽轻而干系重——明代四夷馆翻译教学述略》，《中国科技翻译》，2011 年第 2 期。

④ 魏源说：“中国人以欧罗巴为夷，皆由不通欧罗巴之语言文字，是以于麻六甲（按：今译马六甲）设书院教师，以教化中国之人。”（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仲夏，古微堂聚珍版，第 6 页。）

到的创办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以中国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教会学校——马六甲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这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远东地区创办的最早的教会学校。除英华书院之外,还有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eman)等人于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创办的一所男塾——“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①以及由英美等国侨民出资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校(The Morrison School),等等。但是,这些教会学校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游移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其英语教学不能算作是中国外语教学的开端,至多只能算是中国外语教学开端的催化剂。然而,英华书院等学校的创办,开始了西方传教士在华人中进行外语教育活动的历史,培养了袁德辉^②等近代中国最早的译才。

从1840年开始,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遭遇来自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被无情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漩涡中,当时的情形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③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④中国的传统教育不得不顺应时势而进行变革,其显著标志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式外语教育的开启。清政府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实力派官僚的强力推动下,开始了以“师夷长技”为中心的拯救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兴办学堂、培植人才。洋务派官僚自1862年起,相继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福州、广州等沿江沿海城市创办了30余所“洋务学堂”,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走上民族复兴之路。

从培养目标来看,洋务学堂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科技实业学堂。其中,洋务外国语学堂是这些学堂中成立最早、影响力

① 相关情况可参见 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5, p. 9.

② 林则徐的首席英文秘书。有关袁德辉的详细情况,参见季压西、陈伟明:《语言障碍与晚清近代化进程(一)——中国近代通事》,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323页。

③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页。

④ 此语典出李鸿章。他曾到英法军舰上参观过,对方“火炮之精纯,子药之精巧,器械之精明,队伍之雄整”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874年呈奏的《筹议海防折》中,他阐述了对时局变迁的见解:“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靡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光绪乙巳四月金陵付梓,戊申五月印行。)

最大的学堂。创办于同治元年(1862)的京师同文馆是我国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外语学堂,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教育的启动,也是中国正规英语教育的肇始。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创办了约7所外语学堂,即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新疆俄文馆(1887)、台湾西学馆(1887)、珲春俄文书院(1888)、湖北自强学堂(1893)。这些外语学堂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人才,如外文翻译、外交官、国务总理、教育工作者,等等。除了外语学堂,还相继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15所左右的军事学堂和福州电报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等14所科技实业学堂。这些学堂大都重视外语教育,而且有些学堂的外语教育质量还非常高,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翻译家严复、伍光建等人都毕业于这些学堂。

贯穿晚清外语教育的另一条主线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展的教会教育。如前所述,近代英语教育始于教会学校。教会教育是中国近、现代由外国传教士或教会设立的一种特殊的学校教育。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与传统教育制度格格不入的异质教育体系。早期的教会学校,大半集中精力于传教士之培养,于语言(汉语、英语)、科学、医学方面,虽有贡献,却很有限。这些学校中,以英华书院、马礼逊学校为最著名。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教会学校逐步从通商口岸向内地发展。这时逐渐出现了具有中学性质的教会中学,教会教育进入发展时期,由最早以小学程度为主,渐渐发展为中学和大学程度的教育。至19世纪末,一些发展较好的教会中学演变成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等。1900年以前,教会学校与中国的教育系统双轨并行,互不干涉。直到20世纪初期,新学制建立,科举制度废除,并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后,教会学校才逐渐被正式纳入中国教育体制。^①

第一节 教会学校的外语教学

一、教会学校概览

(一) 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开始

虽然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但是,西方基督教会在中

^① 本章主要根据拙著《晚清外语教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的相关内容补充修改而成。

国创办学校是在 19 世纪上半叶。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他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创办的英华书院是按照英国模式首次在海外以华人为主要对象开办的一所向中国学生介绍西方文化、学习英语的新式学校。道光十四年(1834), 马礼逊病逝于澳门。时人为了纪念马礼逊的去世, 于道光十九年(1839)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校, 这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第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教会学校, 标志着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开端。

(二) 教会学校的竞相设立

道光二十二年(1842),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英国政府获得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并且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 自后有传教者来到中国, 一体保护”。^① 这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敞开了大门。1844 年起, 《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相继签订。这些条约对在中国成功地从事传教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完全改变了先前禁教的状况, 外国人在华传教合法化, 并允许他们原先只在通商城市, 后在中国任何地方随意建造教堂、医院、学校及房屋等。^②

1842 年, 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到香港, 次年在香港正式开学。1843 年起, 香港这个有许多外籍人士居住的西方化城市, 十余年之中就已开办各种学校约 10 所, 且拥有一定数量的女子学校, 开一代风气之先。从这一时期开始, 西方教会相继在中国沿海地区开设教会学校。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的爱尔德赛女士(Mrs. Aldersay)于 1844 年在宁波开设一所女子学塾, 这是五口通商口岸最早成立的女子学校。1845 年, 美国长老会差会在宁波设立崇信义塾。该校于 1867 年迁往杭州, 改为育英书院, 其后又发展为之江大学。1850 年, 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开设徐汇中学。1851 年,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斯女士(Emma Jones)在上海虹口创办文纪女塾。它是著名的圣玛利亚女校的前身。1860 年,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ohn M. W. Farnham)设立清心男塾, 后发展为清心中学。传教士创办的学校, 从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起, 截至 1860 年之前, 确切可考的, 仅基督教新教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六地就开设各式学校有 50 多所, 有

① 转引自王嘉弘:《从李春生对进化主义的反驳看其在近代思想史的定位》, 台湾东海中文学报, 2007 年第 19 期, 第 280 页。

② 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5, p. 10.

学生 1,000 余人。^①

(三) 早期教会学校的成因及特点

来华传教士把教育当作传教的一种新方式,是有具体原因的。首先,宗教与教育有“自然而强烈的亲和力”。^② 宗教和教育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具有培养人勉力向善、开发人们的智慧潜能的功用。其次,传教士兴办学校,开展识字教育,开设英语、算学等西学课程,希望能够培养一批他们所信任的教徒,从而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再次,促使传教士转向教育工作是由于使中国人信仰基督的工作出奇地缓慢。例如,福州的美国卫理会教徒花费十年时间才施洗一个教徒,到 1853 年,全中国只有 350 名中国人受洗入教。传教士只好将目光转向孩子,对孩子作感化工作会加快这一进程。

但是,在儒家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土地上办学,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容易。首先,招生异常艰难。中国人对洋人抱有深深的疑虑与敌视,如有些中国老百姓担心传教士会将他们的孩子煮了用来制作鸦片,把孩子的眼睛挖出来做望远镜,或为了邪恶的目的将孩子贩卖到国外去。因此,学校很难招到学生,“1859 年福州设的育英女学校,刚收住校生时,有 7 个学生来校,隔了两三天,或因被邻里耻笑,或因受族人反对,就走了只剩下一个了”。^③

师资也是令传教士们深感头疼的问题。招聘在学识 and 职业操守方面合格的教职工对传教士来说犹如登天。他们时常发现其雇佣的助手“道德上有过失(a moral delinquent)”,莫宁格(Mary Moninger)的学校雇佣的第一个中国人被发现以算命作为副业,第二个中国人有两个老婆。糟糕的是,一个中国教师被发现教学生如何赌博。而且,传教士本身也几乎没有接受过教学及学校管理方面的培训。教师队伍不稳定,由于休假、调动、被开除等方面引起的人事变动对早先创办的教会学校产生了负面影响。^④

教会学校办学条件异常简陋,有时就在传教士家里或某个地方租来的一间屋子里上课。1880 年之前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没有自己的校舍。课程

①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8 页。

②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页。

③ 金忠明等:《中国民办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1 页。

④ 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5, pp. 14—16.

设置、教学及管理、教科书的编写等都体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而且没有学制,学到哪儿算到哪儿,学生也就没有毕业一说。学校创办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手段培养在华传教士和信徒。因此,其课程设置的特点是以宗教教育为其主要内容,兼授中国典籍和英文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课程,如“圣经、英文……格致(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电光、化、算、诸学,与及中国经史典籍”。^①这跟仅研习儒家典籍和经史之学的传统蒙学大相径庭,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几千年来陈陈相因的教学内容格局的突破。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利于招收学生外,还在于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素质的传教工作者。鲁珍晔(Jessie G. Lutz)说:“有些传教士开办学校,用中国经典、西方历史、科学、数学和基督教义来培养未来的基督教工作者。中国经典是使牧师取得知识分子地位所必须的;科学和数学是训练推理能力所不可缺少的;西方历史和地理是构成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成分。”^②

但是,这种注重自然科学和世界知识的课程设置及其教学客观上拓展和提高了中国学子的视野和素质。容闳、袁德辉、黄宽、黄胜、唐廷枢、何进善等人日后在各行各业中的出色表现即是证明。

(四) 外语教学的发轫

早期教会学校主要是由英美传教士创办,因而开设的外语几乎都是英文。如前所述,教会学校的程度都比较低,大多数以小学为主,由于受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威慑,来华的传教士不多,创办学校的数量也有限。开设的课程除基督教教义、中国文化经典课程外,相当多的学校开设英语课程,学习初步的英语读写技能,还将英语作为格致、地理、历史、算学等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教学媒介。但是,1860年以前教会学校的外语教育,除了像马六甲英华书院、马礼逊学校等少数教会学校的效果较为理想外,一般都有限。

教会学校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演变,到了19世纪最后30年,逐渐出现中学性质的教育。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绝大多数的教会学校都很重视外语教育,有些学校一改以往的免费入学,甚至提供饭食或学费等做法,向学生收取不菲的学费。这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教会学校已得到中国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可。到19世纪末,个别发展较好的教会中学发展成为教会大学,教会教育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本节选取早期教会教育开展得较好的两所较有代表性的学校进行讨论。

① 周之德:《振兴学校》,《中西教会报》,1897年8月,第3卷第32期。

②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6.

二、马六甲英华书院

(一) 书院的创办

马六甲英华书院创办于 1818 年,是一所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传统的教会学校,由第一位到达中国广州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Rev. William Milne, 1785—1822)于 1807 年在新加坡马六甲创办。根据《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书》(*General Plan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Forming at Malacca*),英华书院“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为接踵而至的传教士提供“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的培训;^①“为恒河以外国家使用汉语的人提供英语语言和欧洲文学及科学”的教育。^②

(二) 学生和教师

英华书院招收的学生数量相当有限,第一学年(1819—1820)只招了 7 名学生。第二学年开始,学生人数呈现稳步增长,到 1839 年学生有 70 多名。学生的入学资格相当宽松:“中国人,不管是否在中国本土出生,也不管是否基督徒都可以入学,如同欧美人是否在印度出生一样。”^③入学的学生几乎大部分是在马六甲出生的华人。所以,一进入书院,这些学生差不多从头开始学习中国官话,英语口语和写作以及其他技能和科学课程。经过 6 年的学习,都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英华书院强调中西语言教学和宗教训练,英语由首任校长米怜^④亲自教授。校监马礼逊不仅参与行政和教学管理,而且还亲临教学一线。^⑤英华书院的教师队伍中,除了像米怜夫妇、马礼逊这样出色的英文教师外,它的汉语教授均证明为饱学之士,如担任汉语教学的第三任校长高大卫(Rev. David Collie),“中国官话讲得与中国人一样好,汉语写作完美无缺”。^⑥理雅各(James Legge)于 1839 年成为英华书院校长,他也是一位饱

① Robert Morrison & William Milne: *Indo-Chinese Gleaner*, 1817—1822,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版, p. 233.

②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1832, p. 110.

③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4.

④ 详见 1832 年 5 月的《中国丛报》上介绍米怜生平的文章: *A Brief Sketch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the Late Rev. William Milne, D. D.*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1832, pp. 321—330.)

⑤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Lanham, Md., & London, 1996, p. 182.

⑥ 周岩厦:《从英华书院到马礼逊学校》,《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

学之士,是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①

(三) 课堂教学及其特色

英华书院的“各项课程之设计,均本以和平传播基督教及东方一般文化为原则,冀以达致有效影响为目的”,即,对欧籍学生,“必须授予中国语文,惟各生得按其意愿在宗教、文字、商业诸科上有所选择”;母语为汉语的学生,“必须以英国语文授以地理、历史、算术以及有关学术与科学之科目”。^② 在所有课程中,英华书院最强调和注重的是英国语言文字的教学,其课程设置有如下特点:(1) 语言和西学相结合。属于语言方面的课程有英文对话、写作、语法等。西学课程有史地、天文、数学等。让学生在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掌握一定的将来谋生所必须的西学知识。(2) 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礼逊要求中国学生阅读和掌握《幼学琼林》、《四书》、《三字经》等传统蒙学经典和基督教经典《圣经》。(3) 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根据学生的程度和年龄,把学生分为一班(高级班)、二班、三班和四班(初级班),根据不同的班级,设置不同的课程,如 1826 年高级班的课程是“《圣经》中记载的历史、英语语法、中英文写作、天文、地理和几何初步”;1829 年的课程包括“哲学、天文、地理、希腊史、算学等”。^③

教学方法上,英华书院摒弃中国传统学堂的单一授课模式,采用近代西方通行的做法,根据学生的年龄大小和程度高低实施分班、分级和分科教学。一是重视经典阅读训练。在课堂教学中要求学生阅读和理解中国经典、圣经、英国文学等,使学生得到较系统的语言文字训练。二是强调技能训练,倡导中英互译。他们精心组织课堂教学,用地球仪做教具,用英文讲解地理知识。开设大量的翻译和写作课程,旨在让学生在翻译和写作实践中掌握英语。例如,书院让学生每天练习英汉互译,通过译文记住一些简单的英文句子及中文翻译。甚至“在每天早礼拜时,必须练习将英文《旧约》的某些章节回译,或朗读英文新约”。^④ 这种让学生直接参与翻译实践的做法,是英华书院英语教学的一大亮点。三是强调朗读、背诵。朗读、背诵等是中国传统语言教学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对英语语言的学习同

① T. H. 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 p. 75.

② Robert Morrison & William Milne: *Indo-Chinese Gleaner*, 1817—1822,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版, p. 234.

③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2.

④ 邹明德:《鸦片战争前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5 期。

样十分有用。

(四) 教学效果及其影响

英华书院的创办,开在华新教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其西式管理、西学课程和西方化校风,为我国教育界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内容,对日后创办的学校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华书院强调中西融合的课程设置,分班、分级、分科的教学模式,倡导经典阅读训练、强调做中学的教学方法至今仍极具传承价值。

英华书院规模不大,从1820年到1834年的14年里,完成学业的学生共40名,但学校所“栽培的知名人士甚众”,^①该校毕业的华人学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接受西学训练,特别是会讲英语的知识分子。较著名的有:袁德辉,被他的美国同窗亨特(William Hunter)称为“专攻英语,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深入研究”,^②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的翻译班子中最重要的成员。第一个中国籍传教士梁发(Leang Afah)于1820—1821年在书院修习神学。何进善(Ho Tsu-Cheen)是中国第一位接受过完整新教神学训练的华人牧师,获得英华书院教师麦沾恩(G. H. Mcneur)的赞誉:“尚未毕业便能阅读英文的新旧约圣经”。^③他是理雅各的高足,协助他翻译儒家经典。《理雅各英译七经》至今仍被世界各国汉学家认为是标准译本。^④宋湖建毕业后于1849年起任教于新加坡学院。此外,英华书院迁入香港时,有吴文秀、李金麟、宋佛俭等三位学生赴英国留学。^⑤此为中国人留学英国之滥觞。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是首批被维多利亚女王召见的中国人。^⑥

王韬在1862年《漫游随录·香海羁踪》中说:英华书院“皆有子弟肄业,教以西国语言文字,造就人才,以供国家用”。^⑦英华书院训练了第一批会说英语的知识分子,奏响了我国英语教学的序曲,为我国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先声。

① 龚道运:《基督教和儒教在十九世纪的接触:基督教入华先驱马礼逊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学报》,2003年新第12期。

② 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③ 刘泽生:《中国第一位基督教牧师何福堂》,《广东史志》,2001年第3期。

④ 费正清 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7页。

⑤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31.

⑥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⑦ 王韬:《漫游随录·香海羁踪》,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6页。

三、马礼逊学校

(一) 创办背景及过程

马礼逊是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他于嘉庆十二年(1807)来到中国,以澳门和广州为基地,从事传教、翻译、教学活动达二十多年。1818年,他和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开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先声。马礼逊将基督教经典《圣经》全部译成汉文,首次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他还倾15年之心血,编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字典——《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此外,马礼逊于1812年翻译出版了《中国文学经典汇集》。^①马礼逊因积劳成疾,于1834年8月在澳门去世。在广州的外国侨民为了纪念马礼逊的去世,于1835年1月发起捐资建立“马礼逊教育协会”,目的在于“筹募基金,开办一间学校,使本地学童,在他们自己的学校中,学习英文,通过这项媒介,使他们进而得以探求西方的各种知识”。^②1839年11月,马礼逊学校在澳门成立。这是一所“以推介英语、西学及基督教信仰为教育目标”^③的学校,教学程度相当于后来新式学校的中学。学校于1850年停办。

(二) 学生及教师来源

根据《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学生的入学条件如下:“(1)不分年龄,性别,在中国内地或海外之青年,并获得协会赞助人接受者,得申请入学,惟仍须由董事会核准。(2)凡六岁、八岁或十岁之儿童,随时均表欢迎接受入学。(3)凡属马六甲海峡、印度、欧洲、美洲为达成学习目的之儿童,如获协会董事核准及家长监护人之保证,乃得申请入学。”^④1839年11月,马礼逊学校迎来了学校成立后招收的亚灵等首批6名学生。1842年,学校迁离澳门,搬到香港,学生增加到20余人。1843年4月,有12名新生入学。1844年下半年,又有10名学童进入马礼逊学校,其规模居全港之冠。

183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布朗(Rev. Samuel Brown)应聘成为学校校长。布朗乃一热心之教育家,“一望而知为自立之人,……其为人和蔼可

① 关于马礼逊的词典编纂及翻译活动,详见张美平:《马礼逊经典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② 高宗鲁译注:《China's First Hundred(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年版,第13页。

③ 李金强:《西学摇篮——清季香港双语精英的诞生》,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92页。

④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V. No. 9, 1836, pp. 382—383.

亲,温然有礼;且常操乐观主义,不厌不倦,故与学生之感情甚佳。其讲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须远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①英文科教师,除了布朗夫妇,还有毕业于耶鲁的麦克·邦尼(Mr. Bonny)。中文科教师由华人充任。

(三) 教学特点

马礼逊学校的特点是“中英文兼备”。中文科开设《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英文科开设“天文、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化学、音乐、作文”。^②除了开设英语语言课程,训练学生的阅读、写作等能力,还将天文学、历史、地理、数学等近代基础科学知识也纳入英语课程的范围,所有这些课程,“全部采用英文课本,并用英语教学”,^③这不仅大大加速学生掌握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还以西学知识和世界知识有效地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素质,这是以往任何朝代的私塾、书院培养的学生所无法比拟的。

马礼逊学校的教学方法有如下特点:首先,有固定的教学安排和教学时间,在教学中将发展学生的智力和身体锻炼结合起来,使学生劳逸结合、松弛有度,“从早晨6点钟开始,到晚上9点钟结束,其中读书8小时,其余3—4小时在户外场地上运动和娱乐”。^④其次,将学习时间分为两部分,“半天读中文,半天读英文”,既重视西学,也重视中学的教学,便于学生今后在通商口岸谋取职位或参加科举考试。再次,注重因材施教。学校迁到香港后,布朗将随迁的学生和后来招收的学生编成四个层次不同的班级,实行分级教学。最后,重视阅读、翻译、写作等语言实践训练。《马礼逊教育会第8次年度报告》称:“学生已经读完所有的《圣经·新约》书籍,从《创世纪》到《以斯帖记》。他们每天以读《圣经》中的片段开始阅读训练。”^⑤《第4次年度报告》有如下叙述:“有些人试图将《孟子》译成英文,在我的指导下,他们还打算练习将中文版的《圣经》译成英文。”^⑥“该班还重视汉英翻译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钟叔河标点:《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页。英文见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1909, pp. 16—17.

②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③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④ 顾卫星:《晚清英语教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⑤ 丁伟:《布朗与马礼逊教育会学校的英语教学》,《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⑥ 吴义雄:《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